

【學術報導】

二〇〇四年中國大陸佛學會議綜述

黃夏年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二〇〇四年，是中國大陸佛學研究學術會議召開最多的一年，一共召開了十八次不同的會議。筆者根據有關資料及親身的經歷，對這些會議做一綜述，以饗學者。

六祖文化學術會議

「六祖文化學術會議」，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在廣東新興縣召開。由廣東社會科學聯合會和新興縣政府共同舉辦。會議參會代表五十一人，收到論文四十二篇。代表圍繞「六祖思想與當代社會」主題做了深入探討，認為六祖法偈中的「心如明鏡」之喻，先出於蒙莊，復同符於象法。以宗門而論，新州實是禪宗之「麥加」，而朝聖無人，可為浩歎。六祖一出生就有了惠能這個名號，許多著作中稱六祖大師名為惠能，這顯然是錯誤的。其始作俑者可能是《宋高僧傳》。惠能大師出生於官宦之家的說法，是其弟子們為弘揚惠能禪法而採用的一種傳法手段；而惠能大師出生於下層貧寒之家的說法，則較為符合惠能大師的實際情況。代表指出，惠能應是禪宗的實際創立人，至少是南宗的創始人。六祖通過「現世精神」解說佛法，為創造一種新的人生態度和生存智慧，打開了方便之門。惠能禪宗的平民性、社會化，是禪宗思想得以傳播、延續發展的原因。惠能獨具創意的法門在「三覺」方面所達到最高境界，在中國佛教史上至今仍可說是空前絕後的。因此要糾正後人乃至今人對《六祖壇經》的覺悟學說思想誤導及其對一般信眾不良的影響，化解來自西方宗教人士的一些誤解與批評。

惠能的思想，正依沿著唯識學、如來藏學發展而來。六祖弘揚無相三皈依，並將它作為禪宗授戒的一種儀式來加以強調，具有警策經有三皈依進入佛門的信徒捨權入實、捨假入真的意義。惠能的清淨佛性是包羅一切的總體宇宙的「精神實體」觀。惠能的改革有：一是重實質而輕形式，二是人性化的趨向，三是自覺的本土意識。惠能的榜樣作用在於：一、立志求佛，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誠意；二、尊師重道，唯求作佛，不求餘物的追求；三、佛性平等，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的自信；四、踏碓八月，求證菩提的恒心；五、下人上智，初生牛犢不畏虎，挑戰權威的勇氣；六、改革佛教，繼往開來敢於創新成為宗師。

與會專家提出，六祖惠能是嶺南文化一面鮮豔的旗幟、新興歷史文化一張閃亮的名片，較好地對六祖和新興的文化特點做了恰當的定位。廣東有豐富的六祖旅遊資源，可以將它們組織起來，成爲一種特色的文化旅遊。以禪宗佛教文化爲主題的旅遊路線，可分爲傳禪之地、鋒芒初露之地、隱居之地、靈異之地、感情之地、生寂之地、賜惠之地幾部分內容。

空海與中日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

「空海與中日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和日本高野山大學聯合主辦。中日兩國學者近六十人參加了會議。學者圍繞空海與密教，以及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展開深入的學術研討。日本學者對日本正史和僧傳記載進行文獻學的分析批判，判定平安末期書寫的〈延曆二十四年官府〉爲最早的歷史文獻，可靠性最高，據此判斷空海於日本延曆二十二年（八〇三）四月十六日搭乘從難波津起航的遣唐使船入唐，是最初選拔的留學僧之一，他爲了符合官派僧人的資格，於延曆二十二年四月七日，也就是啓程前夕匆忙剃度。然而，這次遣唐使船於四月二十一日在瀨戶內海遭遇風暴，嚴重受損，不得不中止航行，翌年方成行，這就與正史所記延曆二十三年（八〇四）入唐相吻合。中國學者根據宋代福建地方誌《三山志》和傳燈錄等史料，認爲空海在長溪縣訪問了建善寺和清潭寺，謁見法常，接觸了律宗、天台宗和南嶽懷讓一系的禪宗；而後到福州，應該到過開元寺、乾元寺、法華院、般若院、南澗寺和石塔寺，而且，還應該登鼓山會見靈嶠；空海在福建的最後一站地，應居住於浦城縣乾元寺。日本學者認爲日本大同元年（八〇六）十月二十二日寫給惠果和尚的信已經將「真言」作爲宗乘來把握，而在日本弘仁三年（八一二）八月最澄給空海的信，也根據空海將密教稱爲「真言密藏」、「真言密教」，稱空海創立的密宗爲「真言」宗。印度的法身現觀莊嚴的傳統，在中國並沒有受到重視，也沒有對空海造成什麼影響，相反，中國的華嚴思想卻對空海產生巨大影響。空海十住心理論的前提，是在引用吸收中國獨自的教理基礎上而建立起來，自成體系。空海的教相判釋，把儒教和道教包括在內，分別定位，採用的是比較思想的方法。因此，應該把空海從時間軸的「付法」和空間軸的「即身」整合起來研究，才能跨越時空，正確把握。

學者對法門寺曼荼羅寶函頂蓋四角的八尊圖像重新進行考證，否定了以前認爲是地、水、火、風和四大明王的觀點，而應是不動明王、無能勝明王、馬頭明王、大輪明王、大笑明王、步擲明王、降三世明王和大威德明王。法門寺寶函中的八大明王按照逆時針方向排列，屬於佛頂曼荼羅系列。中國學者認爲，空海的六大緣起說是他發揮顯密經軌的微言大義提出來的，是在《大日經》五大種子說以及五字門、五輪觀的基礎上，把顯教的六界說轉化爲密教的六大說，尤其把色識轉化爲心大，將表述現象世界的概念上升爲說明世界體性的本體論學說，六大緣起說是空海的獨創，屬於日本真言宗的理論體系，不能作爲唐代密宗的理論甚至整個密教的緣起論。日本學者考證了空海請回的「現圖曼荼羅」的圖像，證明現圖九會金剛界曼荼羅是以「本經系」的《金剛頂經》爲基本架構，同時積極吸收《金剛頂壇陀羅》以及印度

非「本經系」的經典等要素製作而成的。中國學者對安西東千佛洞第二窟密教壁畫，對多種曼荼羅圖像進行分析考證，提出自己的見解。日本學者整理研究唐代不空三藏翻譯的《理趣經》，比較世界上流傳的各種語言版本十種，分析其形成的過程，以及學界的不同見解，從唐朝玄奘翻譯《理趣分》以前未見廣本的情況出發，認為其形成過程是從略本發展為廣本。中國學者研究空海《文鏡秘府論》的版本流傳情況，逐一查閱日本學者介紹的二十四種版本，發現存在著誤錄和遺漏的情況，並找到清末楊守敬帶回中國、現流存於台灣故宮博物院的版本，得出共有二十七種版本之說，其中抄本二十六種，版本一種。考證了《文鏡秘府論》成書的時間可能在日本弘仁八年（八一七）完成初稿，弘仁十年修訂。

天台山濟公文化研討會

首屆「天台山濟公文化研討會」，五月十日至十二日在天台山臥龍山莊和天台縣博物館召開。由天台縣委縣政府主辦，天台縣委宣傳部和天台縣社會科學聯合會承辦。來自北京、上海、香港及浙江杭州、台州等地的專家學者及社會各界人士三十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主題是「天台山濟公文化」，共收到論文十五篇。代表將對濟公文化的理解概括為三句話：「一、濟公是人，不是神；二、濟公是傳統中的顛僧，是大智大勇的典型；三、濟公是特定時代的化身，是文明盛世可以弘揚的藝術力量。」認為在當今社會，研究和探討濟公文化，應該激濁揚清，儘可能淡化和剔除其神出鬼沒迷信庸俗之處，提煉弘揚其精神向上的文化內涵，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學者對近代以來以天台濟公會、濟公壇為核心的民間信仰作了系統的評述。認為二十世紀上葉天台濟公會（慈善總會）是一個由信佛秀才發起、士民廣泛參加、以中國濟生會為模式的民間信仰與慈善組織。該組織兼容三教，以扶乩的方式吸引信士，以詩詞曲賦的形式光大濟公扶危濟困、懲惡揚善的精神和傳統的道德觀念。通過對濟公故事研究，得出：

濟公文化的形成，來源於儒、道、釋、俠等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素，以及台州、杭州和浙江地區的區域文化的特徵。濟公身上包含著不少中華民族思想的精華，也反映出民眾的喜怒哀樂，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澱。濟公形象是累積型的、發展的、鮮活的、開放的。因而濟公不僅是天台的，也是中國的、世界的。

對歷史上濟公的家世和濟公的生平特別是歷來爭論不一的濟公生年及年壽等問題考辨，為有關濟公生平事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學者對東南亞地區德教以及德教中濟公崇拜的介紹，闡述了濟公崇拜通過民間宗教信仰的形式以及海外華人這一特殊的群體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的事實。學者強調，濟公是台州、天台文化的代表，天台的山水和文化傳統養育了濟

公，造就了濟公的精神；濟公的浮沈市井，嘻笑怒罵，放蕩不羈，是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抗爭，是大智大勇的表現；濟公的「瘋癲」是兩宋禪風巨變的註腳，是臨濟禪風的變相；濟公的俠義精神受到中國自古以來崇尚的俠客精神、儒家的入世、道家的逍遙、佛教的慈悲及神通等思想的影響。

中國無錫靈山「人間佛教與社會關懷」研討會

首屆「中國無錫靈山『人間佛教與社會關懷』研討會」，六月十二至十三日在江蘇無錫市舉行，由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研究所、江蘇省佛教協會主辦，無錫祥符禪寺和無錫靈山勝境管委會承辦，來自全國各地的佛教界與學術界人士一百餘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七十餘篇。學者認為，佛教之所以能夠被世人接受，就是它的理論是建立在人的基礎上的，建立在社會現實上的。佛教提出的理論問題，都是圍繞人的訴求而展開的，將人放在第一位，注重解脫，這是佛教與人為本思想的核心。關注今生、關注現實，以及理性化、世俗化和現世性、相對性等特徵，都直接或間接地排斥著超人間，從本質上來講，佛教的超人間同理性化、世俗化、相對性、現世性等是直接對立的。人間佛教的提出，就是要解決人的問題，與「鬼的宗教」和「死人宗教」區別開。所以，今後的人間佛教，仍然要體現這兩個基本點，並在此基礎上，將佛教光大。人間佛教是區別於傳統的佛教，是中國佛教歷史上繼禪宗之後的又一重大創新。「文化佛教」是人間佛教建設的重要途徑。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相比較，是以眾生為本位轉為以人類為本位，由以僧人為本位轉為以社會成員為本位，由重生死大事轉為重人生，由重出世轉為重入世，由追求彼岸淨土轉為建設人間淨土，由依靠他力的易行道轉為依靠自力的難行道，總之，在佛教的理論學說、修行方法、追求方向和解脫目標諸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學者指出，「人間佛教」在考慮佛教人間化的過程中，如果能夠照顧到宗教與世間法之間所可能存在的緊張，並不斷釐清自己與世俗生活之間的交集與邊界是必要的。佛教的慈悲精神，是人間佛教的本色行當。淡化乃至排斥超人間特性的趨勢必將繼續加劇人間佛教的世俗化、功利化、過分理性化等負面影響，最終不斷消滅佛教的魅力，嚴重威脅佛教的生命力。

「人間佛教」作為一種運動，在思想和實踐的維度上都有相當豐厚的意義資源，也存在很大的論述空間。當前在人間佛教的理論上，還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必須釐清。例如，人生佛教、人間佛教、人間淨土、唯心淨土幾個概念的內涵、外延為何？其各自的真諦是什麼？彼此的關係又是如何？人間佛教則重人生，不重人死，倡導積極入世精神，由此如何處理、協調佛教關於人生與人死、入世與出世的關係，並從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加以說明，這是人間佛教面臨的重大問題。「文化佛教」對於完善人間佛教的理論建設，提昇人間佛教的品質、品格、品位都有著重要意義。如何把握兩者的聯繫與區別，是我們在推進「文化佛教」建設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而又謹慎對待的事情。

學者認為，無論是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還是印順法師乃至趙樸初居士的人間佛教，儘管名稱上有些變化，但是人間佛教的核心思想並未改變，那就是建立以人為出發點的適應現代社會、提昇現代社會的佛教理念。通過對佛教思想長期的領悟，結合中國社會的特點，樸老精闢地將人間佛教思想概括為「一種思想」和「三個傳統」，從而將人間佛教理念確立為中國佛教發展的長期性的指導思想。比起太虛、印順對人間佛教理論的闡述與豐富發展而言，趙樸老與星雲大師的貢獻和價值更表現在他們對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地推廣和不斷實踐，他們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也將由此而奠定。

學者說，中國佛教之所以能與時俱進，關鍵是各個時代的高僧大德多能注意契理契機，人間佛教繼承中國佛教的這一優良傳統。今天，佛教要實現自身形態的現代化，與時代同步，關鍵就在於當代的高僧大德能本著契理契機的原則，採取適宜有效的教法。重新發出「人間佛教」——在人間行菩薩道——的呼喚，揭示人性的緣起本質。在弘揚人間佛教時提倡儒佛會通，對於指導現代社會人心是有其積極性的，將儒家的人倫道德納於人間佛教，必將使得人間佛教更符合民眾的道德需求和社會心理，使佛教進一步紮根民間，深入民心！人間佛教以「適應今時今地人的實際需要」而弘揚，在「服務人群、利益社會」的事業中發展。在新的條件下，單靠佛教本身的四眾進行人間佛教建設是比較困難的，應該建立更加廣泛的同盟，團結更多的人共同進行佛教建設，使之獲得更快的發展。建設人間佛教，需要傳持者、信仰者、研究者、關心者四個方面力量的密切配合，這是佛教的新「四眾」。學者提出，推行全方位的佛教教育，倡導正信的佛法，建立完善的居士教育體系等幾項未來發展的建言，期望以此改善當前的居士教育現狀。

淨土宗文化研討會

第二屆「淨土宗文化研討會」，八月四日至七日在山西太原舉行，由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山西省佛教協會、山西交城玄中寺主辦、山西綿山風景區協辦，來自全國各地包括台灣的六十餘位專家學者和佛教界人士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三十篇。研討會的目標是：弘揚淨土宗文化、探討玄中寺在淨土宗演進史上的作用、確立三祖師在淨土宗歷史上的地位、研究人間佛教與西方淨土的關係、提昇佛教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整體功能。學者認為，淨土理念之旨趣是讓人厭離娑婆世界而往生西方淨土，如何認識與融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與建設人間淨土的關係，將是涉及到未來中國佛教發展前途與命運的大事。以義學為特徵的唯心淨土與以救度為號召的彌陀淨土，對於淨土信仰在現代社會的價值意義，學者們從社會精神空間的拓展與精神境界的提昇方面對此作了闡發。從宗派學意義上看，曇鸞、道綽、善導三祖師應該說是淨土宗的真正創立者。但由於歷史的原因，曇鸞、道綽並未能列入中國淨土宗傳統的十三祖之列，為緬懷祖師法乳深恩，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大會倡議「中國淨土宗十五祖」之說，希望使曇鸞、道綽大師名列祖位，不致使其功德湮沒於歷史塵埃之中。

「全球化進程中的宗教文化與宗教研究」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

「全球化進程中的宗教文化與宗教研究」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台灣靈鷲山佛教基金會暨台灣世界宗教博物館聯合舉辦。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高校及宗教研究機構的一百多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有十四位代表在會上發表論文。代表指出，對中國大陸當代宗教學術研究進行分析，指出其認知轉換的過程、學術關注的重點、以及對社會輿論的影響，乃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也對世界範圍之思想文化交流中的宗教理解做出了有益的貢獻。站在中國傳統宗教文化的立場上，應促進全球化良性的循環，走向全球共存共榮的全球化。不同宗教之間加強溝通與對話，超越衝突，共同創造全球整體利益。強調全球化的前提，必須建立尊重、包容、博愛的共識，引導世界走向和平。我們的世界確實正走向第二軸心時代。世界各大宗教之間的關係需要從對抗走向對話，從宗教一元論走向宗教多元論，對宗教的理解需要從本質主義轉向關係論，諸宗教需要有意識地從第一軸心時代轉向第二軸心時代。通過宗教對話使自身對其他宗教有更深的意識，從全球視域中關注人類的苦難和生態危機，使諸宗教不僅適應時代，而且自覺地引導我們的世界走向第二軸心時代。全球化過程中宗教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現階段的「全球化」潮流實際上是美國伊利雅德時代的延續與強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研究在問題意識、內容範疇、主題選擇和方法途徑等方面可以從伊利雅德的「新人文主義」中找到極富洞見的思想資源。

中國九華山地藏文化學術研討會

「中國九華山地藏文化學術研討會」，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安徽九華山東崖賓館舉行，由九華山佛教文化研究會主辦。來自韓國、中國北京、浙江、陝西和安徽等地的專家學者七十餘人出席會議，收到論文二十八篇。代表指出，明代以後，四大名山的地位基本確立。九華山的僧人在開發是山的建設中，依靠的是地藏精神。這就是佛教所說的「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之四句話！也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精神。地藏精神內容廣泛，境界高遠，無私的奉獻，功德無量無邊，是全世界、全人類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處在轉型期的社會，面對各種矛盾和變化，更加需要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如果我們把地藏精神適當地加以批判的改造，吸收其合理的內核，使之與時代需要相結合，它一定能對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民族精神的發揚，人心向上，起到某些推動或補充作用。

所以我們應該重視地藏精神的弘揚工作，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大無畏精神積極參與社會人生活動，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貢獻一份智慧和力量。代表強調，九華山應該突出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建立屬於自己的獨特空間，以特有的佛教文化面貌吸引世人。在打造九華山精品品牌時，應注意充分調動和發揮佛教界的主動積極性，因為九華山是佛教的名

山，佛教界在這裡是主體之一，在政府的引導下，如何發揮佛教界的積極性和作用，更好地為九華山經濟發展服務，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未來的九華山發展，只有在與佛教界的精誠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取得一個雙贏的局面。

中日第十次佛教學術交流會議

「中日第十次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十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在西安舉行，由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與日本佛教大學聯合主辦，陝西省佛教協會、西安市佛教協會和陝西戶縣草堂寺聯合協辦的，主題是「鳩摩羅什譯經與中日兩國佛教文化——紀念鳩摩羅什誕辰一六六〇周年」。日本學者高橋弘次教授對鳩摩羅什所譯《阿彌陀經》、玄奘所譯《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及梵文本《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有日譯本）進行詳細對照，對比考察了羅什和玄奘所譯《阿彌陀經》內容的詳略及譯文的異同，揭示了兩種譯本的不同風格和特色。福原隆善教授對鳩摩羅什所譯《佛說阿彌陀經》既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往生，又講有人若執持阿彌陀佛名號，「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命終可以往生的內容，參照隋代智者大師的《阿彌陀經義記》、襄陽石刻《阿彌陀經》、唐代善導《法事讚》、日本法然《選擇集》和《阿彌陀經釋》、唐代窺基《阿彌陀經通贊疏》、日本源信《阿彌陀經略記》、唐代懷感《群疑論》等著作，進行詳細考察，指出「聖道門」與「淨土門」對稱名念佛的不同見解，著重指出法然的「淨土門」是將一念與多時、平生與臨終念佛等同看待，對淨土法門關鍵性問題的研究很有參考意義。

中國佛教學院向學法師發表了〈鳩摩羅什和《般若經》〉一文。回顧了般若系經典在中國的翻譯及早期般若學的弘傳。日本落合俊典教授發表題為〈「三菩薩傳」羅什譯質疑〉的論文，對現存《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三菩薩傳」的真偽及相關問題進行考證。認為近年在名古屋七寺發現的源於唐本系統的《馬鳴菩薩傳》是真本，當是鳩摩羅什弟子僧睿據羅什講說的內容而整理編集的，而以往通行的編入大藏經的《馬鳴菩薩傳》及《龍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皆屬於偽本。「三菩薩傳」雖情況不同，但最初皆基於羅什的講說而編，不屬嚴格意義上的譯書。中國王亞榮教授從鳩摩羅什所在的長安譯場著手，提出「長安文化」概念，並從中外文化互動的角度來觀察羅什譯經的歷史意義，認為鳩摩羅什譯經已屬「官譯」的國家文化事業，後秦僧官制度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政教關係新模式的確立。

紀念慧遠大師誕辰一六七〇周年學術研討會

「紀念慧遠大師誕辰一六七〇周年學術研討會」，九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在廬山召開，由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江西省佛教協會、廬山東林寺聯合主辦，來自全國高校、研究機構、寺廟的一百二十多名教授、學者、法師參加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五十多

篇。學者強調，慧遠作為中國漢地早期佛教奠基人之一，其所創建的廬山僧團是漢地教團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廬山僧團的僧制建設，也為中國佛教早期教制的構建提供了新型的僧團模式。即便在今天，探討廬山僧團理念，也有助於全面推進佛教事業。慧遠佛學理論的主要貢獻就在創造性地為中國佛教確立「神不滅」的基本理念，並使因果報應在理論上非常圓滿，這對民族發展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慧遠協調了佛教儀規與中國文化的融和，使中國人也接受自作自受的業報思想。慧遠結社共修，創闢了一個非常好的交流修證的模式，開創了與儒道各界名士的交往渠道，蓮社精神使廬山成為團結知識分子之地。學者指出，慧遠禪學觀其實是由其法性實在論這一根本的佛教思想立場所決定的。其法性論雖有變化，但其中一以貫之的基本觀點則是法性實在。由此，禪觀修行的真義自然就是不斷滌除無常變化的內心欲望和內外諸色、不斷向「不變」之「至極」探索的過程，直至這一內在於修行者的「至極」為止。

學界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一個主流觀點：「神」是慧遠的因果報應思想中承擔果報的主體，就是對慧遠法性思想的嚴重誤解。產生這一誤解，主要有二原因：一是在神滅與神不滅的爭論中，神滅論者多在精神、意識或靈魂的層面上理解神這一概念，而慧遠則沒有辯明他思想中的神與對手所解義的根本差異；二是從牟子開始，佛教界歷來就有人將神不滅理解為靈魂不死，並視之為因果報應的承擔者。在此情形下，人們一論及慧遠的神，就將其混同於靈魂並視之為果報的承擔者。關於諸賢從理境上顯法性、法身，故說法性、法身本空，慧遠則從修行悟道的角度論法性、法身，意在借有證空，故說法性、法身實有。

學者認為，淨土法門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至東晉時已歷經二百餘年磨合，能否給出淨土徵信，成功應對挑戰，乃直接關涉淨土宗在中國的傳布。徵信四要素是「時、主、處、眾」，此四要素的和諧整合，圓成了震旦淨土徵信之大事因緣。時即蓮社啟建提供之契機，法爾自然地成就淨土徵信之「時」。主即鳩摩羅什所譽東方護法菩薩的遠公大師，堪為蓮社之主。處即淨土宗這一極具超越性的宗教，在震旦隱逸名山——廬山生根開花結果，妙合天然。眾即指遠公肇立東林寺後，緇白二眾精英之士望風而歸，踴躍回應。學者強調，般舟三昧重般若智慧的特性，與當時時代趨勢的結合，使慧遠領導的廬山僧團具有「禪慧並重」的特點，而這正是後來「禪淨雙修」的濫觴。其所倡行的念佛法門，是注重智慧的觀想念佛，以觀想工夫獲得感應，求得功德，阿彌陀佛信仰被認為是爾後淨土宗的始舉；創建道場，專心修禪，則被後世禪宗奉為禪門典範。慧遠特別注重律學的修習與戒條的修持，以提高自身的素質與定力，尤以為一切佛教活動，均以戒律為根本。慧遠大師的念佛思想主要是基於《無量壽經》而非《般舟三昧經》。

中國梵淨山佛教文化研討會

「中國梵淨山佛教文化」研討會，九月二十三日，在貴州印江護國禪寺舉行，六十多名專家學者與會。代表們圍繞中國佛教、貴州佛教、梵淨山佛教以及佛教與現代社會等方面的

關係，共同研討了佛教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並對梵淨山佛教文化進行了重點研討。專家一致認為，梵淨山彌勒道場由來已久，是公認的佛教名山，雖然歷經劫難，但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開放，梵淨山佛教正逐漸煥發出蓬勃生機。專家們提出，應充分挖掘梵淨山豐富的佛教文化內涵，將佛教文化研究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進一步提高梵淨山的影響力。當前梵淨山佛教的弱點在於有所混雜，滲入了一些地方宗教。如果談及發展，應該有一個正本清源的過程。

「現代文明與宗教對話」中日學術會議

「現代文明與宗教對話」中日學術會議，十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北京舉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日本東洋哲學研究所共同主辦，主題是「現代文明與宗教對話」，北京各高校、各科研院所及相關機構專家學者約一百人參加了這次會議。學者認為：「『求同』是我們宗教學者共同探討關於宗教對社會可以做出什麼貢獻，縮短人群之間的距離，造福社會，維護和平，消除造成敵視隔閡的因素。……容忍傾聽不同的聲音，同情地理解不同的意見，以廣闊的胸懷展示寬容的雅量。」宗教對話是通往文化共融、避免社會衝突、使人類真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橋樑，儘管它要面對現代社會中的經濟競爭、政治衝突、意識矛盾、信仰抗衡、種族歧視和認知誤解，但必須努力走出種種困境，才能使其美好希望真正成為現實。可以從宗教寬容的角度看待《法華經》的包容主義立場，蘊藏於佛教中的「權宜方便」的變化觀，「法界緣起」的圓融觀，「善世利人」的倫理觀和傳教弘法的和平觀，是有益於當代宗教對話的寶貴思想資源。

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六屆年會

「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六屆年會」，十月十九至二十日在重慶大足賓館舉行，來自各地的專家學者六十餘人出席了會議。二十餘位知名專家做了學術報告。從保護、管理、歷史、考古、藝術、宗教、建築、服飾、器物、民俗、旅遊等方面，做了學術交流，主要集中在對寶頂山石窟性質的認識上，如寶頂山是否是密宗道場，建造寶頂山石窟的資金從何而來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學術交流。

海峽兩岸馬祖道一與禪宗文化學術研討會

海峽兩岸「馬祖道一與禪宗文化學術研討會」，十一月二日至五日在江西靖安寶峰禪寺召開，由南昌大學江右哲學研究中心、江西省佛教協會、宜春禪宗文化研究會主辦，靖安縣人民政府、江西佛學院、靖安寶峰禪寺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河海大學、南京金陵刻經處、福建師範大

學、廈門大學、浙江工商大學、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大學、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韓國東國大學、台灣國立聯合大學、中華佛學研究所、中台禪寺、佛光禪淨法堂、福建佛學院、湖南省佛教協會、成都文殊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法師共五十餘人與會，收到論文三十餘篇。

學者認為，道一提出的「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標誌著「心」的佛教在中國的最終成熟。中國佛教的基本範式乃是「心」的佛教，慧思在中國開創了「心」的佛教的先例。智顛的天台「止觀」和惠能的「南宗禪」是其中較為著名的「心」的佛教的形態。馬祖道一所開創的「心」的佛教乃是中國「心」的佛教的最成熟形態。道一禪學思想一是完成了禪宗哲學本體論由般若唯識派的「心有法空」，向《大乘起信論》及華嚴宗的「心物同一」論的轉化，為禪宗南宗確立了佛性觀，使惠能及其以前的「緣起性空」、「唯識無境」論，一變而為體用皆如、心物同真的理事圓融論。學者認為，晚唐五代社會因佛性思想變得更加人間化和平民化，較複雜的禪宗戒律變為簡單化，加上動盪不定的社會上的種種因素，終於讓禪僧們走出深山峽谷，抱有出世救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積極干涉世事，揭露或批評世事，出現了「禪者儒化」之入世現象。

馬祖道一繼承惠能以來之禪法，提出「即心即佛」之說，後為破除弟子對法之執著，而提出「非心非佛」說；再到馬祖再傳弟子黃蘗的「無心」說，大抵以如來藏為中心，經過幾代的演進而逐漸地轉向般若為核心的禪法，這些說法的轉變，除了是繼承惠能的「轉經」精神，也深刻地呈現了禪師說法的確是「當時權化、一隅之說」。宗密對洪州的研究，至少保存了較早的洪州思想的基本紀錄，對於後人理解中唐時代的洪州宗是有重要意義的，對於他的批評，不能僅局限於自宗一門來思考，而是要面對當時整個禪界、整個教禪相分的佛教界、整個以儒釋道為代表的文化界、整個中國社會，特別是政治層面對於宗教的需要來思考。學者考辨百丈禪師所創立的古清規，在百丈時代，是稱作《禪門規式》，在宋代以後，才被稱作《百丈清規》。馬祖弟子及其再傳常常利用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見色明心，譬如，禪師豎拂子、舉拳頭、翹起一隻腳等等。第二，聞聲悟道，譬如敲碗、敲鼎、彈指、打地，等等，皆屬於「聞聲悟道」的範疇。第三，棒喝斷妄，譬如人問：如何是佛法大義？師便打，等等。第四，無理路話，譬如禪師問學人：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等等。

學者說，由於「文字禪」的思想運動在傳統禪學的話語系統中被過多地進行了否定性的敘述，以至於現代禪學研究，還沒有充分注意這一新的典範所具有的意義，對其思想的處理也過於簡單化。學界一般對禪宗語言哲學的研究，都是以唐代禪宗文本作為對象進行處理的，而這只能理解為中國禪宗語言論的一種類型。宋代出現的「文字禪」是不能簡單套用這一類型的，它表示了一種新的「典範轉移」。禪宗之於分別事識上參究攝持而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實質與「以獨特的禪定方式經歷了死亡過程」的小乘禪也是一致的，只不過，禪宗禪秉承大乘禪的精神，更注重在生死的日常形態——生滅上做功夫，它力圖在心能包含感知的生死形態——生滅的實際情形——事識之分別上，參究攝持。只有在心海之識浪的動轉遷流中不斷研磨參究，直研磨參究得生滅剎那、剎那生滅細密更趨細密，乃至生滅以及內

外、遠近、能所、久暫種種分別泯入無間，這樣才能轉識成智、心開悟解、超凡入聖。所以，禪宗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實就是「轉識成智」，只不過是採取了更契合中國文化機緣的形式而已。

中國臨濟宗會議

「中國臨濟宗會議」，十一月六日至八日在浙江省杭州臨安市西天目山禪源寺舉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宗教學會、河北正定縣臨濟禪院和杭州臨安市西天目山禪源寺共同舉辦。來自北京、上海、吉林、浙江等地八十餘名學者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六十餘篇，內容十分廣泛，涵括了每個朝代，又顯示了地方的特點。學者們圍繞「臨濟宗」的主題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認為中國佛教的研究，以往偏重於通史概論，並較多集中於唐之前，近年來對宋元明清的佛教研究逐漸加強，但尚未形成規模。類似臨濟宗研究這種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應該成爲一種新的趨勢。從中國臨濟宗這個獨特的視角出發，沿著一條清晰的線索，可以對中國佛教作一個大發現。

中日佛學會議

第一屆「中日佛學會議」，十一月六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舉行。由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舉辦。來自全國多個高校、科研機構、出版機構及相關單位的代表共八十餘人參加了會議。會議主題是「本覺思想研究」，共有十位學者發表了相關研究成果，從不同的切入角度和學術立場，展開了熱烈的學術研討。它們是：張風雷教授〈天台智者大師對《生法論》的批判〉，龔雋教授〈梁譯《大乘起信論》的本覺論思想分析〉，李四龍教授〈天台智者的如來藏思想〉，周貴華教授發表論文〈如來藏與唯識思想中之 dhatu 類概念〉，林鎮國教授〈本覺與現代性——重探二種佛教之爭〉，末木文美士教授〈本覺思想的定義與類型〉，菅野博史教授〈《大乘止觀法門》中的「本覺」和「不覺」概念〉，駒澤大學松本史朗教授〈如來藏思想與本覺思想〉，伊藤隆壽教授〈道・理的哲學與本覺思想〉，花野充道教授發表論文〈佛教思想的本覺展開〉。

吳越佛教文化與社會學術

第二屆「吳越佛教文化與社會學術」，十一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舉行。由杭州市佛教協會、杭州市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研究會主辦，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協辦，杭州佛學院承辦，來自日本、韓國、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有關專家教授及高僧大德七十餘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六十餘篇。與會代表圍繞著永明延壽的生平思想及其影

響和價值，展開了充分而又深入的討論，指出延壽所倡導的禪教一致說是隋唐以來佛教發展所出現的一種必然趨勢，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要求。

延壽對禪教一致說的論證，是以三個方面來展開的：一是以禪宗的「心」作為統一其他各宗派教義基石，把佛教一切教義都歸結到禪宗之「心」的根本義；二是認為禪與教的關係，是佛的心意與佛的言教的關係，是本原與現象、內在與外在的關係，因此是相依相即，相互統一的；三是禪與教在修行實踐上的關係，是心與行的關係，強調心的覺悟要落實到修持的實踐上來，而一切修持實踐的功德又回歸到心，這樣才能成就自心的覺悟，而進入到成佛的境界。延壽所表達的是一種「隱喻」關係，是以作為「文本」的文字去關聯作為實在的「心」，因此它對宋代禪宗對於語言文字的興趣是有啓發作用的。延壽所說的以心為宗的「圓融」雖有「調和」之義，但這個「心」卻是具有《起信論》所說的「實體性」之意味。而印歐語系佛教（包括巴利文佛教和部派佛教）則不同，因重視分析性，「定義」清晰，故不會走上圓融之路。

儘管延壽調和了「西方淨土」與「唯心淨土」之間的矛盾，但他更重視「唯心淨土」，「西方淨土」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是達到「唯心淨土」的一種途徑。也有人認為，延壽對於「西方淨土」的信仰非常堅定，絕非「權宜之計」，他融會自力與他力，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淨土宗的走向，正因為如此，他才被尊為淨土宗的第六祖。延壽《四料簡》的主旨不是提倡「禪淨雙修」、「禪淨融和」，而是「抑禪揚淨」。有人說《四料簡》「不可能出自延壽之手，而是後世假託」，其產生的時間「大致應當在南宋中期至元代初期之間」。但還有人說《四料簡》是延壽的作品，認為它係偽託之說，是源於近代學佛者認識的顛預籠統，《四料簡》是站在專修方面說，是方法論，從其見地看，與《萬善同歸集》等所闡述的延壽思想還是基本一致的。學者建議應加強對《宗鏡錄》的研究，通過確認其中引用文獻的準確度，可以澄清中國禪宗史的新問題。

佛學研究方法與佛教文化建設學術研討會

「佛學研究方法與佛教文化建設學術研討會」，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福建廈門大學舉行，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江西、湖北、湖南、廣東、浙江，以及台灣的佛教學者和法師一百餘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五十餘篇。學者指出，在當今中國佛學研究的兩支大軍中，學界流行的主要是理性主義；教界盛行的則是理性主義，在理性與信仰的關係下，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一)將理性與信仰視為兩個截然不同、彼此隔絕的範疇。即認為理性涉及現實，信仰關乎價值；理性的終極是客觀世界，信仰的歸宿是彼岸。理性與信仰互不相干，各有各的統轄。(二)將理性與信仰視為一對矛盾，兩者存在著根本的衝突。即認為理性是科學、進步的力量，信仰則是歷史遺留的愚昧殘跡，隨著科學的發展，信仰終將被理性所取代。(三)認為

理性與信仰雖然在側重的領域、標準、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是人類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是相融而非相斥的。

盲目信仰或無同情理解都不能看清佛教思想，只有用客觀理性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深入觀察，同情理解，才能看清和把握佛教思想。近現代的史論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超出歷史研究本身，從歷史中接受經驗教訓，探索佛教發展的歷史法則，從而把握佛教的發展方向和本質，還是能給我們在進行研究時有一些啓示的。現在從事佛學研究應有使命感。要有批判精神、創新精神和歷史感覺。要善於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的態度是湯用彤先生的「同情之默應」。對佛教經典或佛教現象有關的資料加以統計分析，能更加精確地把握其中的內涵。代表指出，教界人士往往強調佛學研究需要有「體驗」，乃至要有「修行」，認為離開了「體驗」與「修持」是不可能真正懂得「佛學」的。教界的「佛學」概念實際上是「佛法」，即包含了理論與實踐的佛教修學體系。佛學乃是對佛義理與修持的理論研究，即將佛法作為外在對象來進行客觀研究。關於佛教的歷史、宗派、人物、經典翻譯、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也歸於「佛學研究」的範圍。佛法則是佛所說「法」，是佛陀所宣示的言教，是關於宇宙人生真相的理論及如何證語的這一真相而達到解脫之境的「實踐方法」。佛法的對象是宇宙人生，佛學的對象是佛法關於宇宙人生的理論。佛法以覺悟宇宙人生為目標，佛學則明瞭「佛法理論」為目標，如冠以「研究」之名，則可以說，佛法研究的是宇宙人生本身，而佛學研究則是佛法關於宇宙和人生的理論。比較可行的是，在現有的學術研究傳統中儘可能重視佛學的特殊性，對宗教的「經驗基礎」（禪悟體驗）予以高度的重視。研究宗教者即使不能去體驗「宗教經驗」，至少也應對「宗教經驗」作哪怕是比量的了知，否則其研究很難說「全面」、「充分」更遑論「客觀」了。

事實上，關於佛教禪定經驗的研究正是現在佛學研究領域最為薄弱的一環，近年來比較繁榮的禪學研究，基本只是禪之哲學研究而已。「佛學」的概念的出現，乃是近代學術按西方學怎麼著分類標準界劃的產物，即它只是一個學科的名稱，而與佛教作業一種宗教形式並無內在的必然聯繫，只是由於「佛學」也以釋迦牟尼開創的經教作為研究對象，才使兩者發生了糾葛。佛學的目標是通過科學的研究，揭示佛教發展的歷史規律，探討佛教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及其他宗教門類的關係。以為現實和未來佛教的發展提供借鑑與指導，而佛教則主要是通過佛教徒（僧侶）的修行實踐，自利利他，使人實現道德精神的超越。佛學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邏輯思惟，重在知解，屬於「比量」；而佛教實踐方法是須依靠邊親證，由直覺而悟入，離不開「現量」。所以只有認清了佛教和佛學中各自的特點和質的規定性，我們才不至於將學術問題與宗教問題混為一談，以科學的方法和態度治佛學，以宗教的方法和態度治佛教，對它們的發展才是最有利的。

在當代佛教弘揚中，還出現了學術化的佛教，及其潮流，這對佛教在文化界的推廣顯然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可學術所能關注的，只是佛教作為文化的層面，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義理及其內證，並不是僅靠學術研究便能觸及的。而作為住持佛法、荷擔如來家務的僧伽，如

果只關心學術層面的佛教，勢必會失去僧伽的本色。學者指出，格義是詮釋學的基本要素和思惟方式；沒有格義，也就沒有了思想概念的歷史發展，就中國文化環境而論，格義是一個永遠體現「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再詮釋或再創造的過程。中國佛教哲學家實實在在地走了一條「文本主義」與「民族文化性格」或者是「漢文字性格」的融和之路，中國大乘禪佛學的原創哲學家有三分之二屬於隋唐、五代、兩宋的禪學大師，而整理這部分哲學家的思想，尚須龐大的隊伍來努力耕耘。把詮釋學和佛學思想的研究結合起來，並嘗試建立具有佛教特色的詮釋理論體系和詮釋方法，「創造的詮釋學」雖然重視方法論，但已經具有存有論的意義與內涵。學者強調，新世紀的中國佛教若要實現與時俱進，必須繼承中國佛教的重視佛學的優良傳統，應當順應時代和社會的發展潮流，結合弘法利生的實際需要，設置課題，開展佛教研究。

當代著名愛國高僧、佛學大師巨贊法師圓寂二十周年紀念會議

「當代著名愛國高僧、佛學大師巨贊法師圓寂二十周年紀念」會議，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江蘇省江陰市舉行，海內外一百多位中國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法師、居士和著名學者參會。代表指出，巨贊大師是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巨擘，體現民族智慧與尊嚴的傑出人物，江陰人民的驕傲。巨贊法師是我國當代的愛國高僧，他在湖南南嶽和長沙等地，組織佛教徒參加抗戰救國工作。他主編的《獅子吼月刊》，對推動廣大佛教徒投身抗日救國活動起了積極作用。即便是在「十年動亂」、身陷囹圄的逆境中，他也沒有動搖熱愛祖國的信念。巨贊法師學貫中西，掌握了英、德、日、俄、法等多國語言，寫下數百萬字的著作和讀經筆記，對密宗、天台宗和印度佛教無不精通，可稱大智慧者。他一生致力佛教改革，提出了「學術化」、「生產化」兩個不朽的口號。他學問好，佛法修持和人品道德更好，光明磊落，從來不道他人短長，大家見面都講關於佛教怎麼改革？怎樣做學問？

縱觀巨贊法師捨身求法的一生，實際上是他普施眾生，將出世法和入世法圓融的一生。一方面他致力於弘揚佛法，一方面他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救民於水火，兩者並行不悖，真正體現了佛法不離世間法的大乘精神。哲人其萎，功赫猶存。我們應向巨贊法師學習：

第一，是他那種追求高攀學術高峰的精神。從佛學知識的廣博和深度講，從二十世紀以來還沒有人可以超過他。他對印度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各個派別、對歷史人物，幾乎都有文章，都作了研究，堪與中國佛教史上幾位大師像玄奘法師等媲美。他通曉六國語言，對書法、詩詞用力之深、對仗之美，對氣功和中國醫學也有深入研究。在他還沒有出版的幾十萬字的讀經筆記中，幾乎對佛教的每個名詞的梵文的原文、演變、中譯、意譯，都作了非常深刻的、系統的註釋。他做了很多為後人學習的東西。

第二，要學他愛國進步的精神。他是一位與時俱進的進步人士，始終跟著時代步伐前進。從年輕時直到圓寂，做了許多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所建立的功勳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第三，與時俱進地對中國佛教改革的精神。他早年追隨提倡人間佛教的太虛大師，在改革教制、教規各個方面，他一直沿著這條路線踐行。代表強調，巨贊法師是佛教界一位奇才。在法師中他是少有的有成就的學者，在學者中他是少有的敢於革新的實踐家。他是僧教育家、是抗戰勇士、是社會活動家。他是江蘇的也是全國的，是佛教的也是全社會的。他的一生始終把個人與佛教的興衰、民族的安危、國家的存亡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他的一生是始終堅持愛國愛教的一生，是始終追隨時代潮流的一生，他用實際行動對人間佛教思想作了最有力的闡述。